

□ 端木赐香

也许是意识形态的缘故,也许是民族天性的缘故,总之,百年辛亥革命演绎到今天,给人们的印象除了宏大,就是“伟、光、正”。如此语境下,细节化历史遂成为一种稀缺。

我一直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真相。所以,通读雪珥的新著《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获得的是一番痛快淋漓的阅读体验。

正如雪珥在书中所云:“为什么帝国的列车会在加速革新进程中突然出轨?这其中的大量细节还被淹没在光环背后的阴影之中。”所以,“我们还是该回归常识,从帝国列车的出轨现场一步步回溯,从官场、商场的每一个凡人的每一个细节去捡拾、拼接,并努力还原当年的场景。如此这般,我们或许能够找出一份更有意义的帝国出轨事故报告”。

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很详尽,很赤裸,也就是很成功。但是,真相是残酷的,更是习惯宏大叙事及“伟、光、正”标签的一些读者接受不了的。甚至有人在微博上问雪珥本人:你的书中,咋就没有一个好人呢?

有没有好人不是问题,读者看书,就是寻找好人,才是问题。

雪珥可不管这些,他噱里啪啦就提交一份报告,这报告叫谁瞧了都难受。首先,中国的近代化,从国门被打

开那一刻,就算起步了。可是之前磨磨蹭蹭,之后随着危机的加深,逐渐走向激进。立宪派的立宪时间表是激进的,革命派的共和目标更是激进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都是另一种版本的大跃进!其次,不管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刨除掉伟大光荣正确的外衣,里面呈现的,只有利益二字。大清帝国出轨,乃是缘于铁路出轨;而铁路出轨,乃是缘于国营民营的进退。按一般常识,我们知道国营不靠谱,可是看雪珥的报告,我们发现,民营也不靠谱,甚至比国字号更加腐败与混乱:“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

腐败混乱、乌烟瘴气不可怕,我们见多不怪了。我们害怕的是,爱国主义成了流氓恶棍的庇护所。明明是利益在作祟,却高叫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再退一步,流氓恶棍我们也不怕,哪个国度又能没有流氓恶棍呢?我们怕的是,流氓恶棍扯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招牌。再退一步,扯出伟大光荣正确的招牌我们也不怕,哪个吾兄不蹲着几个蒙面人呢?我们怕的是,蒙面人一出手,却能迅速煽动广大无脑的民众跟在他们身后运动、群众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群众。

四川保路运动,就是这样开张的。四川保路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帝国政府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一切随之轰然而倒。在这一场事故中,倒下的不见得是豆腐渣;立起的,不见得是优品精良。都说大浪淘沙,可是大浪也能淘金啊……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反省这场事故,到底哪儿出错了?还在向往清末的宪政,如果没有这场事故,我们是不是早就成就了模范宪政?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在历史的三岔口张望,目睹着这个民族总是在路径选择的时候直奔那个最坏的路口,怎么说都会让人羞愤不已。总之,看看雪珥的此书,增加些羞愤吧。雪珥的书不是慰安的,是揭伤疤的。揭得痛了,不仅能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还会引起伤者自身的痛楚。所谓的历史智慧,说白了就是不能光记吃,还得记打。否则历史会换一件外衣,重新演绎到我们眼前,信否?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这是一句多么清新、素朴而内涵深厚的诗。它是全书精当、简练、画龙点睛的引子;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又大致能够概括这部散文集的风格。

其实在这以前,我就读过彦林同志的许多散文,应该说相当熟悉的了。我早有此感觉:他的散文作品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创作风格。

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应当说是非常难得的。我本不想在不同路数、不同风格的散文之间进行比较,但在当前庞大的散文产出中看到数量不少的类型化、“公众模式化”作品比比皆是的风头下,我又实在不能对有特色、风格鲜明的可贵表达不表示由衷的赞赏。而彦林同志的这些以写乡情生活为主体的散文作品确是当前应当受到欢呼的突出典型之一。

虽然,我们也看到,关注农村(或追忆农村生活)、重于乡情的散文作品现在和以前也并非个别,其中有的也不失为上乘之作,但值得重视的是,彦林的多情散文确有自己的独特视角,独特感受,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且他绝不是以旁观欣赏者的角色出现,更不是那种冷眼搜寻者觅踪猎俗的记录文字,而是对淳朴的乡情、可亲的人物乃至给予祖辈和自己赖以生存的熟土抱有爱之不尽的纯情与深深的敬意。作者的这种爱意和深情延及母亲般的土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乃至整个大自然。给读者的感觉是,这一切就是生命之根,水乳之源。更深刻的是,他是离开乡村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大地之子的身份,却保有对那片土地不断的根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重新感受乡亲,重新审视这里的一切,由此便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人性和美学的层面。

众所周知,彦林同志同时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的散文语言的锤炼功夫无疑与对诗的悟性有很大关系。譬如说,他的散文重扮具象而不冗长,重不乏细节但极其俭省,以精当到位为省,等等。但他的散文仍然是散文,而且最富于散文的特征,极少有将诗的形式直接引入散文的情况。本来,他在诗作中也很善于抒情,而他的散文虽也富有抒情性,却基本上是在对具象生活的描写和感受中“注入”了抒情的意味。这样才能造成他的散文具有丰富性与抒情性、生活化与诗质高度和谐之所长,“奥妙”可能就在这里。

还应提到,读彦林的散文,另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它的完整性,显得浓密结实却又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读罢总的感觉是一个圆,而不是那种拉拉杂杂的东一锄头西一耙,最后的感受是没有“型”。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有很大的随意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没有错;但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散文也需要起码规范,不是可以随意挥写的。从表面上看它的确比较自由,但内在的章法还是有所讲究的。我之所以说彦林的散文都有相当的完整性,读起来是一个“圆”的感觉,就是因为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必要的规范和一定的章法。譬如他的《享受春雨》就是循着一条清晰的思路进入了春雨的情境:“也许是刚经历了冬天太多的郁闷和压抑,也许是寒风、残雪在记忆的底片上留下太多的沧桑与悲凉,万物掐灭生命的色彩,关闭生命的声音,孤独地萧条着,沉默着。一夜微风,唤醒早春三月黎明的呼吸,也吹来了北方第一场春雨……”随后就是几个骤然的“点”:春雨对人心绪的过滤;春雨贵如油;春雨又是会说会笑的精灵,等等。虽也浮想联翩,但均未逸出心灵中春雨的规范。由此可见,散文必要的规范,首先是内在所欲表达的那块生活与灵性的天地,如此才能自如地驱策外在章法的营构。而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散文的自由和随意性,过了就是一种误导,势必在初学者中造成散文最容易写,怎么写都是散文之弊端。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彦林的散文既是比较传统的又具有很新的创新意识。他的尊重传统,首先是合理地坚持与吸取传统思想、道德乃至风习中的优秀的东西,这也就是他多情散文的根基所在。再就是正确运用古典的和现当代文学中经过淘滤的精髓与表现手段,来反映他钟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说,他旨在求新创作,而又避免当下散文中那种以怪为新式、以看不明白为新式的倾向。

一个作家清醒的“定力”是极宝贵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独具风格的散文作品在当前铺天盖地的散文产出中尤其可贵。

□ 石英

【闲读随笔】

## 有知者的谈话

□ 周鲁霞

杨绛先生的文字当然是喜欢的。《干校六记》中的这段文字印象很深:“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于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之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读过后,感到“文革”的荒谬:一群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里的知识分子,却碰上如此哭笑不得的遭遇。廖哲在其《祸枣集》中,也提到这段文字,却有不同的解读。想起杜甫的《再呈吴郎》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一无食无儿的寡妇,常去吴郎院里打枣充饥,为此吴郎把院子圈了篱笆。杜甫以诗相劝:老妇苦,打几个枣,也就打吧。廖哲感慨:杜甫“自己贫不聊生时,对穷人犹怀有仁慈”,恢复了仙位后的知识分子,奈何“仍这样愤愤于尘埃中人呢?”

这篇“不为困穷宁有此?”的短文,几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记得当时有读者提出异议,认为杨绛先生的文字只是白描,并未对贫下中农有愤愤之情。面对苦难,廖哲希望知识分子有所担当:“有知者与无知者的区别,是前者受了苦会抱怨,会诉苦,后者却讷讷不能言。故有知识的人,道义上有为后者代言的义务。”廖哲的解读,流露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情怀。这是一种视角,也是一种追求。

正因为如此,同样的事情,廖哲总是会给出不一样的说法。比如,当我们在怀想和追忆民国教育和学术的时候,廖哲却认为:“我想咱们缺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身自束: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媚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大害,是我们心行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躬身自束,恰恰也是士林所缺失的。

因为《祸枣集》,廖哲清俊、典雅的文字颇受追捧。廖哲认为:“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是古来的老话题”,“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对语言,我们总是看轻的,认为不过一形式、技巧。其实,我们以语言思维、思想的圣洁与语言的圣洁互为表里。“高屋建瓴,语重深长、意义深远”等诸如此类的官话套话大行其道,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思想的空虚或贫乏。这种东西泛滥,会像堰塞湖般危险。

《祸枣集》是三联书店济南店的白峰先生力荐的。白峰感叹:“有见识,会写。”概括得真是准确。归根到底,还是有见识,许多东西因此而高下立现。

三联书店济南店,这个承载了泉城一批爱书人多年记忆和梦想的书屋,近年来在市场的夹缝中已经潇洒不再地四易其址了,所以年年赔钱还在苦苦维持,就是经营者的那份热爱和信念。市场经济真是法力无边,就像一把功率巨大的电锯,所到之处千年古树也会顷刻倒下,更不用说那一片片的小树林了。对书店的遭遇,我是有些愤愤然的。尽管也不知道“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经营者——一位扔不下旧理想的人,还是坦然面对,尽力维持。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躬身自束吧。

廖哲称,《祸枣集》写的全是谈话。其实,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自由等,并没有多么高深,就是一种脚踏实地,就是一点道德勇气。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彦林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出版

可贵的是独特而隽永的创作风格

□ 灯影书香

百年辛亥演绎到今天的解读

□ 史海钩沉



@黄老邪:《元气糖》没俏著,当作家没俏的文字遇见设计师朱赢椿的匠心,原本食忆类专栏已被雕刻成可一再把玩、唏嘘、浮想联翩的一个物理的清新——甚至连书中的焦糖、布丁、酸汤、水饺乃至隐隐的甜齁齁的甜亦随之一并清新起来……它当然敌不过眼下这个污浊之夏,可有清新一握在手哪怕10秒,也算好吧?

@止庵:友人某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有些奇怪,本来欲说保尔与冬妮亚那段儿可能还有点意思,转念一想,这个以前在别的书里写得多了,也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滥调而已。他说所留心的是朱赫来是怎样去影响和改造保尔,即人是如何被炼成钢铁的——“我”变成“我们”,人变成非人——其中颇有值得深思之处。

@一起笑忘书: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围城》刻画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像,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书中典故极多,是难得的一本越读越厚的小说。先不说别的,开篇时那条满载着希望和喧嚣的轮船“布拉日隆子爵”,其实是法国大仲马的名著《三个火枪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也译作《布拉热洛纳子爵》。

